

大象之舞

——中国课改：
一个教育记者的思想笔记

余慧娟 著

大象之舞

——中国课改：
一个教育记者的思想笔记

余慧娟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策划编辑 谭文明
责任编辑 谭文明
版式设计 徐丛巍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象之舞：中国课改：一个教育记者的思想笔记 /
余慧娟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 1
ISBN 978-7-5041-9228-8

I. ①大… II. ①余… III. ①课程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2747 号

大象之舞——中国课改：一个教育记者的思想笔记

DAXIANG ZHI WU——ZHONGGUO KEGAI: YIGE JIAOYU JIZHE DE SIXIANG BIJI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1277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7.25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1 千	定 价	3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观察者

从来没有刻意想过要写一本书，直到要为中国课改十年策划点什么的时候，回望过去，才发现，在不知不觉中，我竟然成了从头至尾、从里到外跟踪这场改革的唯一的教育记者。

历史是什么？

曾经阅读过一本著名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叫《街角社会》。这本书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原本是冲着学习质性研究方法去读它的，不料，却是书中反映出的美国选举的内在机理击中了我。它改变了我以往对美国民主制度大而笼统的看法。如果不是这本真实记录美国社区选举的著作，我很难深切地体悟到其制度的弊端。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们认识、记录事物的角度，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

难道“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2001年，我刚到《人民教育》教室不久，就负责跟踪报道课改。说实话，那时候，我们并未获得“彻底的信任”，参加改革领导者的高层会议，获取任何“核心”一点的资料，都是困难的。和许多老师一样，我们也是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关于课改理念的解读。到课堂去听课，和老师聊天，倾听他们的困惑，自己去理解课改相关的文本，跟着老师去听培训课……后来，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执着，也许是我们的作品有了些许反响，也许是因为别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总之，改革者很诚恳地“接纳”了我们。于是，我获得了从内部透视这场庞大而复杂的改革的机会。有很多次，我与实际的改革推动者进行激烈的讨论，常常就敏感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另一方面，我也从来没有放弃和学校校长、老师以及各种专家交心彻谈。这期间，我还在就读研究生时以学生身份深入学校，调查课改对学校的真实影响。这种种机会，使我获得了从多个侧面观察改革的视角，进而形成了与他人完全不同的观点。

课改一开始虽然轰轰烈烈，但并不为很多人所了解。直到2004年一场前

所未有的关于知识的学术争论公开于公众面前；2005年3月，几十名“两会”代表签名提交提案，并公开在《光明日报》《四川日报》上叫停“数学课程标准”，课改才从一场专业领域的改革变成了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公共事件，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很多次，我的脑海里不断地闪过一些画面：没完没了地灌输，重复机械地训练，几十年都不曾变化的教材和教学模式……这些画面，和某些专家、教授的理论论证，无论如何对接不上。他们知道当下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吗？他们知道今天的学生已经不可能老老实实接受“昨天”的训练吗？他们依然坐在象牙塔里想当然地抱定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吗？

让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一些所谓的权威数学家在批判课标的时候，居然在原始引证上出现错误。对于课标的问题，竟然是“听来的”，而非自己的阅读和研究，更不用说是调查了。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还有一次，和几个“名师”一起吃饭，听到他们“恶狠狠”地批课改，那种情形，像是与其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因为课改，他们之前的教材都“不能出版”了。

改革从来都是利益的调整和博弈。学术流派是利益，专业指挥权是利益，教材更是利益。无论一种言论看起来多么正气凛然、言之凿凿，其背后，都是一种利益代表。这让我感到十分悲哀。究竟会有谁，真的是在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为我们国家的未来在说话、在做事情呢？公共利益在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纷争中，总是处于弱势的；而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迫于种种压力，也常常会深陷其中，难有作为。

我很庆幸，作为一个媒体记者，我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这使我拥有了客观观察和评述的可能，也拥有了听从内心真实召唤而写作的可能。

十几年过去了，这场改革无论如何都会被记入历史。正如同我想查询以往的课改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除了些许粗大的线条和简单的结论，什么也得不到一样，对于后来者，若想了解这场改革，无非也和我一样去查文献资料，可以想见，他们能得到的，不过是一堆的争论和碎片化的“事实”，而争论背后

的东西，自然是看不见的；争论所基于的“事实”究竟是不是“事实”，自然也是不能得知的。缺失了这些关键判据，如何能将改革看得透彻，如何判定哪些才是教训，哪些才是经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

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很可怕。如果每一次改革，都以草率的记录结束，然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下一次改革，教育便不会有真的进步，相反，除了瞎折腾以外，只会败坏教育者的胃口。

这是我今天克服种种困难，来出版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原因。

课改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千百倍。表面上看，不过是课堂教学目标的调整、教学方式的改革（这二者是在实际传播中流传最广的），冰山之下，却是观念、体制机制、文化等庞大体系的变革。没有后者，前者很难有真正的大面积的成功。因此，课改从一开始就困境重重，直到后来举步维艰。从横向坐标来看，中国有三十多万所中小学，两亿多名学生，千万余位教师，其覆盖面之广、影响队伍之大，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回想起来，整场改革就像一头大象在跳舞，沉重而艰难。由于专业，一般人很难走进深处；由于关乎实践，所以复杂；由于庞大，所以很难驾驭。许许多多的言论者更像是一个个摸象人，每个人看到的，都只是大象的一小部分，有的甚至不是大象本身。这些在历史的舞台上跳跃的碎片，却构不成对历史的真实认识。当一切归于平静，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十几年？没有对这十几年的客观梳理和评价，中国基础教育又该如何走向下一个十年？

好在，读者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早在2005年，我发表的年终述评文章《课程改革的路必须走下去——2005年的叩问与沉思》，从教育现实和民族国家利益的角度为课改正名，呼吁超越瑕疵坚持大方向，赢得上至教育部官员，下至校长教师的广泛认同和共鸣，成为影响决策的一股力量。2012年1月《十年课改的深思与隐忧》一文，我又以十年记者经历为佐证，从文化角度客观回应课改中的诸多敏感问题，提出个人观点。文章发表后，很快收到业内专家、校长的短信、邮件，认为“客观”、“深刻”、“犀利”、“振聋发聩”，并再次激起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和深思。

记者是为读者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读者的认可，记者是没有价值的。“读

者认可”的背后，其实是媒体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感。我很欣慰，浸透在每一篇文章中的真诚与热情、责任与忧虑、批判与建设能够为读者所感知，他们和我一样，心中跳动着良知的脉搏，涌动着对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深深的热爱。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珍视的成就感。

课改更大的价值，在于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并给予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重新审视中国基础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的机会。这是 21 世纪头十年教育给予中国的一份珍贵礼物。

于是，便有了我在课改深处对教育问题的诸多思考，一并与读者分享。

是为序。

余慧娟

2014 年 2 月

目 录

第一辑 十年课改的深思与隐忧 001

课改对于中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002
朱慕菊：这是一场针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改革	011
“课改典型”的文化解读	022
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被丢弃了吗？	025
现实课堂改变了多少？	029
课改失败了吗？	031
未来的道路在哪里？	034
把“人”写进教育的核心——课改十年述评	036
中华路小学：十年课改全记录	048
海淀进校附校：课改的“胜利者”	070
南山课改：走向精致的微观主义	083

第二辑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97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98
“减负”之惑	104
由“第三种负担”引发的“课堂革命”	107
“位育”：教育之最大民生	119
启蒙者	122
学校生命力的重大转折	144

第三辑 教学黑洞 147

课堂文化决定了什么？	148
终身兴趣的培养与教学的“审美化改造”	151
我们的能力黑洞	155
什么是好的教学——就中国教师关心的问题访马飞龙教授	159
探寻教学改革史的几点感想——从尝试教学法谈起	166
杜郎口模式会是又一颗“流星”吗？	175
我怎么看当下流行的教学模式——李庚南访谈录	184

第四辑 为自己的精神气质负责 195

为自己的精神气质负责	196
教师思考的贫困	199
做文化的自主选择者	201
叩问教师：是什么决定了课堂的生命力？	204

教育需要虔诚以对——李吉林访谈录	208
理论素养：让中国教师真正“站”起来	214
教师如何突破那块天花板？	216
叶澜：我是一个喜欢迎风走路的人	221
语文教学是人性的教学——崔琪访谈录	236
李晓风：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	254

后 记	266
-----	-----

第一辑

十年课改的深思与隐忧

有一些问题，如果不去碰触，会永远纠结在心头，成为前进的障碍。
有一些影响，即便不愿意承认，也会一直延伸下去，成为未来的方向。
正视一场改革，需要勇气，需要胸怀，需要责任。

2005年年初，最大剂量的“炮轰”指向课改，课改要停下来吗？还是应该继续向前走？为什么？

课改对于中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2005年是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的第五个年头。按照计划，这一年9月，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近乎所有的起始年级都进入新课改。

3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一颗重磅炸弹开始投向数学新课标。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姜伯驹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教授刘应明院士，分别提交了针对此次课改中有关数学新课标的提案。

3月12日，刘应明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对数学新课标的不同观点，题目是“‘思维的体操’在走样”。没隔几日，《光明日报》刊出一篇记者采访姜伯驹的文章《姜伯驹：新课标让数学失去了什么》，姜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应立即停止使用数学新课标。此举顿时在基础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两篇文章直指数学新课标。

几个月后，教育部中断原定的新课改工作日程，重新组建“《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

9月，第二批进入高中新课改的省份，由计划中的四个减为一个。

这期间，媒体上的争论，民间会议、网络上的讨论沸沸扬扬。针对新课改的各种观点包括猜疑也层见叠出。

新课改的走向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轰动”的意义

仅仅是一场围绕数学课程标准的讨论，何以引起如此大的动静？

清楚这次课程改革孵化过程的人都知道，数学是新课改的一面旗帜，它凝聚了本土研究的成果，也是新课改诸多理念诞生的土壤。对数学新课标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新课改的质疑。

当然，这还与我们向来的讨论传统有密切关系。对于国家决策，我们习惯了褒扬，习惯了温和地提出建议。像这样提出尖锐意见的情况，实不多见，因此也怨不得有人闻风而动。

所以，如果撇开意见的内容来看，这件事情在我国课程改革的历史上是有开创意义的。它表明，课程作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品，要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作为课程标准的推出者，政府要能够作为平等的一方参与“学术性”争论。而建立起相应的渠道与规范程序，以确保交流的畅通、问题的解决，则凸显为对政府的一项制度要求。它也在告知改革的参与者，不同声音发出来，并不意味着否定，并不意味着大转向，而是一种正常的讨论。无论决策还是执行，都可以成为一个“民主”的过程。

如果将这件事情与2004年年初以来教育学术界“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大争论结合起来，那么，值得我们思索的就不仅是“数学”的问题了。近几年来，新课改最初在中小学掀起的巨浪，已渐渐变得平静，代之以冷静而理性的反思，以及对最为艰难也是最为重要的考试与评价体系改革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这两次大争论，无异于两针清醒剂，令改革的组织者清醒，也令改革的执行者反思，同时提醒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该对新课改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认真的思考了。

用理性来削减摆幅

两位院士的质疑，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更改了数学课程体系，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删掉了部分平面几何之类培养数学思维的重要内容，淡化了推理证明等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东西，低估了学生的能力；教材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装饰”、“非数学的东西”，以致数学的理性培养任务被淹没；整体水准大为下降，“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这些意见引发了数学界的大讨论是可想而知的，但这里，我并不想介入其中，而是试图去寻找这里面蕴含的一般意义。

熟悉数学史和课程史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这里的争论点大部分

落在不同学术分歧的争论区域内。所谓减少几何内容或降低难度，增加“非数学的东西”，不过是数学的非形式化思想在起作用，期待增加那些在数学上被认为最容易有创造性的思维培养，问题是非形式化多一点，还是多两点，形式化减少到什么程度。当然，这还与“教育”中的数学有关系，就是说，必须考虑学生的兴趣，考虑好学、会用，所以要增加很多情境，搭很多桥，但也有一个多寡的问题。说“整体水准大为下降”，则与教育目标有密切联系，既然大家都承认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公民，那么在原有的学术课程基础上降低难度是自然的，问题是，降低到什么水平才是合适的？才是最能调和“精英”与“大众”不同发展需求的矛盾的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度”的把握。

类似这样的问题并不少见。在更微观的领域里，比如，语文课提倡让学生多读、多悟，老师少讲，可是怎么个“少”法？“少”到什么程度才是恰当的呢？说接受学习有弊端，那是不是就得完全弃之一边呢？

2005年年初，许多教育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关于日本宽松教育的争论文章。这或许也代表了业内人士的一种集体焦虑。2002年日本正式实施的“宽松教育”，近几年一直遭到大学教授们的严厉质疑。争论的焦点也惊人地指向“学力下降”，认为这是宽松教育过于“宽松”的结果。

改革无非是在一个问题的两极、一个事物的两面之间游走。改革的动因很多时候就源于过去的“度”不合理，改革本身也常被指责为“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所以，从课程改革的历史来看，就如同一副钟摆。从每一次课程改革的过程来看，也都免不了是一部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史。争论令改革者感受到张力，争论也在使钟摆趋近中心点。

但是，仅仅停留于口头的和经验的质疑是没有力量的。“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个教育中永恒的问题，并不是几位学科精英就能够下断语的，因为教育不只为学术服务。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数学课程的“非形式化”才是恰当的，也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说得出来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以细致而长期的研究为基础。教育水准是否下降，还要看什么能代表教育水准，以哪个水平为“准”，如何知道目前的实际教育质量。否则，争论除了打几起文字仗，令改革者更加感到这是一条没有地图的道路外，于课程改革本身并无任何

益处。

日本的争论延续了好几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分晓已能见于旁观者。为什么？因为无论是反对方，还是主张者，都拿出了各个方面的科学测量数据。测量量表、样本量的对照，使得基于思辨层面的争论立即明朗起来，也使得道路清晰起来。

“度”的存在，实际上是在要求现代课程改革走向精细化的科学研究。如果说历史上，人们更多地只能靠经验和猜想来做事情，那么今天，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课程改革，信息与数据的搜集，知识与能力、方法与效果、“三维”目标之间等多种基本关系以及规律的基础研究，则着实应该与新课改相随相伴。然而反思一下，新课改走到今天，除了前期的一些准备，又有多少丰厚的实证跟踪研究来支撑内容和方式的具体变化呢？又有哪些权威的本土研究来应对外界的质疑呢？实验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正常的，可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变成减小钟摆摆幅的力量，那么新课改将会成为没有多少价值的改革。

当然，我们无法期待研究或测量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它们的能力有限，而教育又是一个细雨润物的漫长过程，影响因素相当复杂。但这并不能成为放弃积累的理由。不然，即使不断地去实践，也只会走向盲目，使改革陷入“无知”。

或许，这是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最为重要的提醒。

被误读的新课程

新课程被误读，并不是今年的新鲜事。

早在三四年前，课程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对于新课程的含混理解就从课堂上、从教师的文章中冒了出来。比如，合作学习就是四人小组议论两句；时兴自主、合作、探究了，讲授就不能再登台，不然，“传统课堂”的大帽子会把你压个半死；课堂教学的“三维”目标也被分列得清清楚楚，端写于教学设计的开头，以示接受了新课程理念的洗礼；不是要“以学生为本”吗？那么“学生喜欢就好”、“学生高兴就行”。结果，“新课程华而不实”成了一些人脑

中的印象。

自上而下的改革，理念要由设计者层层向下传达，有变形也很正常，再加上每个人的理解水平和角度不同，千差万别也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惊讶的是，不少人在用简单化的、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如果老师们处于“江湖之远”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新课程的很多理念在课程专家那里被解读得大相径庭，就有些让人诧异了。《中国教育报》上就不曾有一篇教师的文章吗？题目就是：“新课改，你说我们该听谁的？”老师们已经被那些不同来历的“专家”们弄得手足无措了。

更为严重的是，在数学家那里也被误读。将教材等同于课程标准，课标里明明有的，却说没有。对实施中的复杂问题也不做仔细分析，一律予以棒喝。

这是否可以归为学风的浮躁呢？我以为，这不仅是学风的浮躁，也是态度的浮躁。

课程改革火了好几年，无论是何种原因，都吸引了不少热心参与者。

我向来以为教师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和新课程打交道，从最细微的课堂教学去一点点感触它、体悟它。但还缺少一点，那就是除了钻研教材、教师用书，还应该看得远一点，与“具体怎么做”有点距离的书不妨也读一读，多分析、多琢磨，加深自己的理解，开阔自己的视野。这是当一个好教师的前提。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教师总能游刃有余地“活跃”于不同的课程体系下，为什么？关键是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在起作用。一个好的教师，并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结论性的知识，更根本的在于他认识事物的方式：不只是微观地研究教材，宏观的资料也要看；不只是听别人讲，也要自己静心思考；不只看书上的，也依据自己的教学实践来做判断。这才是做教师应有的职业态度，也是剔除浮躁的应有方式。

“课改专家”是老师们给许多大学教授以及对新课程深有研究的人的尊称。可是，这个称号也渐渐成了民间的一个客套语了，不时夹杂些异味。因为确有鱼龙混杂的现象。不深入研究、一知半解就上台讲课的“专家”大有人在。这是学风浮躁带来的态度上的浮躁。

至于数学家们来关注新课程，当然是一件好事。在中国，向来少有这样的

尖端人才来关心“小孩子的事情”。可是，如果只是偶尔地“关心”一下，而不是用做数学研究那样的态度，去一一研读批判的对象，也不亲自去做一点实地调查，则未免过于肤浅和不负责任。

新课程层层被误读，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因为它使那些闪光的教育思想简化成了苍白的形式外衣，变做时髦的标签，也因此成了被攻击的对象。而真正的问题，却被遮蔽起来，无人问津。

这对一个新生事物来说，是最可怕的陷阱。跳出这个陷阱，依赖的是认真、踏实、负责任的基本态度，是所有人都应该持守的职业精神。

新课程是欢迎大家评头品足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倡导民主、开放的文化。重要的是，每个人在开口说“新课程”的时候，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能够说：我已经认真地研究过它了。

给教育留下一点理想

“如果全面否定了现在的新课程体系，我们还能回到哪里？以前的那个体系肯定是回不去了。”这是一位网友对数学新课程遭到质疑以后发出的叹问。

2005年以来，由于争论的原因，也由于新课改推进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难题逐渐暴露，很多人私下里议论纷纷，对新课改能否进行到底产生了怀疑。“新课程的理念是好的，但是……”这可能是中小学教师们在谈及新课程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课程改革当然复杂。它的复杂不在于理念本身，而在于要面对一个复杂的社会。

2004年9月，第一批初中课改生毕业升入高中，因为在理科基础知识与技能方面不能比拼那些未参加理科课程改革的学生，在个别地方遭到歧视。没有人对“学习积极性高、乐观、思想活跃、爱提问”等这些品质有所在乎。学生感受到的，是“落后”的沮丧和“补课”的巨大压力。即将进入初中的学生家长纷纷让孩子“逃离”课改学校。新课程“加重”教师和学生负担的说法由此而出。